

顾问 陈 坚 陈子善



中外郁达夫 (下册) 研究文选

主编 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郁达夫研究文选



中外郁达夫 (下卷) 研究文选

主编 李欧梵 陈建华 陈平原

上海三联书店

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

(下 册)

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 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 / 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主
编.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308-05046-7

I. 中... II. ①李... ②陈... ③陈... III. 郁达夫
(1896~1945) — 人物研究 — 文集 IV. K825.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573 号

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

李杭春 陈建新 陈力君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萍 钟仲南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23.75

字 数 596 千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7-308-05046-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072522

父亲形象的缺失及其替代

——郁达夫个性心理研究之一

袁庆丰

“世界上没有好父亲,这是规律。且不要埋怨男人,该埋怨的应是已经腐朽的父子联系。做爱,自然妙不可言;但要是生孩子那就是天大的不应该了!……我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年轻的死人,他没有来得及当我的父亲,而今天他却可以当我的儿子了。……

我的运气在于我是一个死人的儿子:一个死者生前曾射出的几滴精子,这是产生一个孩子的常规条件”。^①

这样大胆冷酷地表述父子关系的作家就是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只有三国时代的孔融与之比肩,他曾用瓶与物来解释母子关系并因此以“非孝”之名为当权者所杀。中西古今对家庭中父母子女关系阐释的异同更多是属于社会学、伦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所关心的范畴,它们与文学领域重合的一点在于:父母一方的早逝,也就是非完全家庭生活,会对一个未来的作家造成怎样的伤害,并一直影响着他的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左右着他情感状态与心理模式的塑造及其艺术表达。萨特没有使用“悲剧的出生”这个字眼,然而,在他表述相同意思之前 20 年(即 1934 年),中国作家郁达夫则已将它用做自传第一篇的题目。而这样的标题没有使研究者们更多地把个人成长的

^① 萨特:《我的自传》,张放译,漓江出版社 1990 年版。

具体环境置于时代大背景之前予以讨论。文化与种族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郁达夫与萨特在对自己的出生及其与生俱来的悲剧性的认识与判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一)

郁达夫3岁时父亲因劳累病逝，因此，父亲的形象在他心目中几乎是一个空白。郁达夫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读书时所写的《丁巳日记》中曾说：“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无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①一年后他又写有《自述诗十八首（有序）》，其第五首云：“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犹忆青灯秋雨夜，虚堂含泪看兄吟。”如果说萨特对父亲角色在家庭生活中的或缺并因这种或缺造成他们母子生活上的艰辛和感情上的伤害所做的尖利刻薄的指责，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家庭父子关系远较中国松散和平等的，那么，郁达夫对他父亲在家庭生活中过早的角色缺失并因此而给他们母子带来的不幸与地位的卑微，则从一开始就抱有一种哀哀无告的痛楚和无所依从的惶惑。相形之下，父亲的早逝造成他的忏悔和“原罪”意识则较为淡薄，他在《悲剧的出生》中写道：“我还长不到十二个月，就因营养的不良患起肠胃病来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发热，由发热而痉挛；家中上下，竟被一条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尽；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有孤儿寡母的正剧的上场。”显然，郁达夫并没有认为父亲的早逝对他在感情上造成多么大的伤害。这固然是由于在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伦理关系中，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人格和道德范畴内的规范与教

^① 转引自于听：《郁达夫风雨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育,并由此承担起对儿子文化知识的传授与培养的责任与义务,即所谓“严父”形象。鲁迅在《五猖会》中就形象地说明一个恪于职守的父亲在这方面是如何严厉地剥夺了儿子应当享有的儿童的欢乐与意趣从而形成“精神上的虐杀”,然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父亲形象和对儿子的影响可以在其他家庭成员的训诫与培育中得到补充和替代,所以郁达夫的祖母与母亲才都一致强调父亲的“正直”即品格上的肯定与张扬。我们知道,父亲形象的补充与替代源于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和至高无上的父权观念,因此,具体形象的缺失无损于这种观念的基础与作用的发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强化。老舍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就将他的父亲的形象予以多方位的修复与组合,其可信性与可亲性达到相当程度,令人不容置疑。所不同的是,郁达夫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他父亲的形象在他笔下没有得到修复与重塑。在他的《自传》和小说中只是一再提到他3岁丧父这事实。

我注意到,在郁达夫的全部小说中几乎没有父亲形象的出现。在他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作、被夏志清称为“露骨的自传小说”《沉沦》中,对主人公父亲的交代几乎使用了和《自传》同样简洁的叙述语句:“他3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不堪。”寥寥数字,一笔掠过,在他后期的重要作品《迟桂花》中,郁达夫则更为翁则生安排了一个只有老母寡妹相伴的家庭背景,几乎是作者本人家庭结构的翻版,因为郁达夫的祖母与母亲都是中年丧夫。这说明了什么?我们不妨提及1936年即郁达夫开始发表其自传后的两年——这一年,《宇宙风》还在连载他的自传——为当时的妻子王映霞的祖父(实际上是王的外祖父)所写的《王二南先生传》。

王二南(?—1931)江南名士之后,诗文并佳,19岁补廪,21岁应试,头场取列,第二场因母病未去,从此一生功名潦倒。中年出宾入幕,屡掌书院,人民国而认执孔庙奉祀。应该说,王二南是中

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失意和困顿的一个代表。我们知道,郁家自曾祖起,三代以教书行医为业,郁氏后人向以书香世家自视^①。那么,郁达夫之于王二南的契合投机首先是价值观念上的认同,他们之间“亲属的观念,倒并不觉得十分浓厚”;其次,郁达夫在王二南身上看到的,是他所服膺和奉行的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与洁身自好的处世原则和人格魅力。但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王二南之于郁达夫又是一种隐约的父亲形象的变相换位与模糊认可。在日常交往中,郁达夫“平时亦常以爹爹呼先生(杭州俗语,爹爹即祖父之亲称),不过自相见以后,熟而缺礼,和先生时时对酒谈诗书,……有时夜半起来,挑灯,喝酒,翻书,谈古今,往往会痴坐到天亮”。应该承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父子关系远不及母子关系来得亲近与自然,《红楼梦》中贾宝玉在贾政面前的惊惧与怵惕这样极端的例证我们似不必提出,即使在现代社会尚有“父子不同席”的风俗沿袭与规则。父权观念在家庭中“无异是放大的皇权”(鲁迅语),在望子成龙的父母期望中,父亲并不过多地涉及情感教育,往往是代之以内藏不露、以刚制柔。因为这是属于“慈母”的职责。祖父与孙子的关系倒是相对融洽。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鲁迅性格中更多地继承和张扬的是祖父介孚公的尖刻、悍烈与质直、强硬^②。类似的施受关系也存在于王二南与郁达夫之间,郁达夫就承认他各方面都受王二南的“感化”不少。

问题的焦点在于,对郁达夫而言,他与王二南的交往与投合,一方面是他对缺失的父亲形象的补充、重塑,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他压抑在心底的替代性角色对他造成的伤害与不可语及的隐痛。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两次不自觉地对自己的个性心理气质予以总

① 参见郁风:《郁达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② 参见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结,一是“不恭少敬的天性”,二是“少年时期那一种厌世偏向”。在其他文字中,郁达夫一再提到自己“自小害着一种自卑狂”,不时地感到“一种身世之悲”;在审美观上,他推崇热爱倾心于“颓废荒凉的美”,甚至刻意追求一种悲哀的美感;在创作中,他更尽可能地把他的这种心理感受模式赋予他笔下所有的主人公甚至不惜因此而强化他们的变态心理,倾吐、宣泄他的牢骚、不幸和伤感。在他笔下的一系列艺术形象中,不论是“我”还是“他”,总是要时时浩叹着“一种莫名其妙”“与生俱来的悲苦”,“老是自伤命薄,对人对世总觉得不满”。为什么这些人物都是伤感万分的“弱者形象”,并一再宣称自己是“零余者”呢?郁达夫所认定的“悲剧的出生”其根源又在哪里呢?

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到郁达夫早年生活中其父亲形象的替代者身上。

(二)

事实上,在父亲郁企曾去世后,在郁达夫早年生活中,家庭中有两个人自然而然地成为父亲形象的替代角色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这两个人郁达夫都承认他们是“兼父职”。从实际情况来看,郁达夫的这种申明都是言深意厚、语重心长的。一个是比郁达夫年长 12 岁的长兄郁曼陀(1884—1939),作为父亲形象的替代角色,他对郁达夫的影响是阶段性和指向性的。严格地讲,他是半角色替代。另一个是郁达夫的母亲陆氏(1866—1937),由于作为母亲的特殊地位,在郁家特殊的环境中,她对郁达夫的影响已超出情感领域而渗透到各个方面,她是郁达夫父亲形象的完全替代。这个集严父与慈母形象于一身的女性,其情感与心态自始至终参与、左右着郁达夫个性心理模式的塑造。郁天民恰如其分地指出:陆氏是这个家庭的“兼职严师”,在郁达夫 13 岁后,因为学业日深,

这位“兼职严师”已“完全恢复到慈母本色了”^①。

郁达夫对长兄父亲形象的替代角色从一开始就表示认同。他后来在《悼胞兄曼陀》中回忆说：“自先父弃养后，（他）对我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长辈。”郁风则使用了更富于法律意义的“监护人”一词，这种称谓与长于事实判定的说法颇有乃父之风^②。在《沉沦》中，郁达夫则称赞长兄“为人正直得很”。郁达夫的祖母和母亲，正是从这种道德评价与人格规范上，为郁达夫描摹与树立父亲形象和楷模的。在中国的家庭伦理观念中，素有“长兄如父”之说，郁曼陀也明确地表示：“一家年少最怜君。”在督促和负担郁达夫知识的接受与教育费用的同时，在郁达夫的生活和职业上，郁曼陀也是从长计议，远为筹划。1913年9月，郁曼陀赴日本考察司法，考虑到“三弟居家，断非上策，此次当偕赴日本也”^③。1919年夏，更劝令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与高等文官的录用考试，当时正值郁达夫刚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一部毕业不久，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之前。其拳拳护爱之心，感人至深。

然而，郁曼陀虽然在郁达夫早年生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携郁达夫赴日留学改变了三弟的生活道路，但毕竟是阶段性和指向性的。昆仲间的关系又与通常的兄弟关系不尽相同，郁曼陀年长12岁，在郁达夫出生后不久，“长兄就离家到杭州府学堂（即原养正书院）求学去了；接着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又考取官费留学生去了日本。这时郁达夫才10岁，正在春江书院上学。郁达夫自幼与长兄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是不多的，“更说不上兄弟间

①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66页。在以后的分析中我将表明对后一个结论有有限度的怀疑和保留态度，因为她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造成对郁达夫的伤害与痛苦，这与鲁迅母亲一样，以“爱”为始发点和凝聚力却就此将儿子推入悲剧性的感情漩涡和性格矛盾中，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消解和背离了母亲的初衷，方式如出一辙。

②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47—48页。

③ 转引自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106页。

有什么总角垂髫之乐了”^①。在郁达夫留日求学与归国前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兄弟俩海天一方,南北睽隔,加之生活环境和职业兴趣的相异,随着郁达夫个性的成熟,长兄的影响日渐减少,其左右规范之力逊于往昔。因此,郁曼陀之于郁达夫“实系兄而又兼父职”的角色替代便形成昆仲间情感与性格纠葛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学术与知识的相互切磋与促进,确立了少年郁达夫的“品行方正”和勤奋好学的刻苦精神,手足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温暖了郁达夫一颗幼小孤寂的心灵;另一方面,年龄与个性心理气质的巨大差异,加之父职形象的替代角度中“严”(厉)的道德规范与期望成分,又使郁达夫产生逆反心理。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郁氏兄弟间的两次公开的、郁达夫本人称之为“齟齬”的矛盾冲突。

第一次是郁达夫留日期间的“改科”事件即弃医(科)从文(经济科)之举。对于这个问题我接受并支持郁氏后人的考证与分析:郁达夫这样做的动机并非是早有宏图大志,以此实现改革社会拯救国家的夙愿,而是因为医科费用浩大,功课繁重而无多余时间阅读他所醉心的西洋和日本文学作品。我也同意引用郁达夫自己的两段话来予以佐证。《遗言状草稿》中说:“欲习医,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平生喜藏书,得钱尽卖(买)书,故日用时不足”;《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写《沉沦》各篇时……谁也想不到(我)将来会以小说吃饭。”并且,郁天民也注意到了郁达夫留学期间经济上的拮据和窘迫曾在《自传》中予以具体的描述:“皮鞋前开了口,后穿了孔。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穿在身上仍同裸着一样;幸亏有了几年前一位在日本曾入过陆军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了我一件陆军的制服,总算在晴天当作外套,雨日当作了雨衣,御了一个冬天的寒。”虽然这样也还是导致郁达夫“种下了致命

^①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114页。

的呼吸器的病根”。这使郁达夫“不无怨望之意。他怨谁？没有明说，也无须明言。那时节，他还没有考取官费，全部生活、学杂费都是长兄包了的”。郁天民接着解释说：“其实，民初派往日本考察，政府所给的公费十分苛刻，曼陀偕夫人小弟同行，除保证公事必需及一家食宿开支外，所余已可想见。……当日中国留学生中，贫寒拮据的原也不少，有甚于作者的”。^①

显然，他认为郁达夫的“怨望”之气是完全指向长兄曼陀的。然而，我不认为事情的根源得到了彻底的溯清与解释，郁达夫常常慨叹的“身世之悲”还是没有完全着落。郁曼陀是当时郁家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郁达夫不能不依靠长兄的接济。当兄弟间的冲突爆发之后，郁达夫还是不时请求长嫂予以接济。所以，郁曼陀只是这种“怨”气和希望落空后郁达夫所产生痛苦的表面指向者和承受者。正如同因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遭到兄长的强烈指责与反对从而引发了兄弟间的第二次公开冲突一样，郁达夫早年生活中在精神上的苦痛和心理上的扭曲，追根溯源，还必须归结并指向郁氏家庭中另一个始终如一的父亲形象的替代角色——母亲陆氏。

如果说郁达夫与长兄的矛盾冲突以表面和公开的形式爆发出来并最终以一定的方式达成谅解的话——第一次冲突的消解因为郁曼陀了解到郁达夫的苦衷和没有将金钱用于不义之行而得以和好如初；第二次矛盾爆发而得以暂时平息是因为郁曼陀坚持郁达夫不公开举行婚礼，不致触犯重婚刑事并得到了后者的保证和事实上的执行——那么，郁达夫与母亲陆氏，母子之间的纠葛、怨望、冲突和由此产生的痛苦则是多层次的。由于母亲同时又是作为父亲形象替代角色的长期性和母子关系的特殊性，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是内在的和复杂的。其表现形式在初期是含而不露、

^① 于听：《郁达夫风雨说》，第114页。

怨而不怒,在后期则频繁地和激烈地爆发并显现出来。然而不论是当事人(主要是郁达夫的小说和散文以及涉及到母亲形象的文字中)还是郁氏族人的回忆性文字,都将其局限于家庭内部关系的范围内。事实上,在一系列的郁达夫研究中几乎很少涉及生活中的母子关系和它在郁达夫小说中的艺术形象的对应关系及其体现。除了对郁达夫其人其文抱有偏见和恶意的攻击者与敌视者如苏雪林外,这种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对应关系与体现,研究者大都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语焉不详。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是他一直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和重要的艺术观念之一,并且在最大程度和范围内得到了他自己创作实践的认证和体现。郁达夫是注重个人体验和独特的心理感受的作家,因此,在《沉沦》集中,他将自身经历和一己体验以最强烈的情感色彩予以艺术渲染和扩张,无疑是顺理成章势在必然的。作家的家庭成员常常是作家创作时最早和最直接选取的人物原型,郁达夫亦未能例外,而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沉沦》将作者自己的出身背景、个人经历、家乡的山水景色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人物的叙述交代也是从实道来:携他赴日留学考察司法、不久又与之反目的“长兄”,“军人习气颇深”的二兄,在他3岁时就死了的父亲,甚至长嫂新生的女儿。可以说,当时现实生活中郁家的重要和主要成员都被作者一一移入小说登台亮相。然而,有一个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始终没有出场露面,没有一言半语的提及,这就是母亲陆氏。

在郁达夫早年生活中,陆氏作为作家个性心理机制生成与塑造过程中的父亲形象的替代性角色,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母亲形象的出现与描述本是小说叙事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半划。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种或缺不是无意,恰恰相反,是本于有心并且是煞费苦心的刻意安排?若非难言之隐、感痛至深,对于极擅情感表露和抒写的郁达夫来说,这个富于艺术意蕴形象的忽略是

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究其本质而言,实际上是郁达夫母子关系与情感方面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尚需对其文本的创作和行为意识作另外的和进一步的考察分析了。

(原载《上饶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实录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中译本序

贾植芳

郁达夫,是我所心仪的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文学作家,我把他视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先行的历史觉醒者,一位在新文学建设中有着自己独特见解的作家,所以,一九三六年冬他重访日本时,我曾参加了当时的留日同学在东京神田的日华学会会堂举行的欢迎会,并聆听了他的长篇讲话。时光过了半个多世纪,我饱经世变,进入人生的暮年时期,在一九八八年为陈其强先生编著的《郁达夫年谱》写的序文中,曾这样描述我对郁达夫的认识与评价:

郁达夫是一位饱读洋书而又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品格和气质的中国现代作家,但他毕生命蹇,不见容于中国社会,他被加上“颓废”、“浪漫”、“放荡”、“色情”各种恶号,无论在新旧社会,都受到新老理学家的蔑视和歧视,是一个所谓有争议的人物。

在我们这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儒学流毒严重,人往往被异化为失去主体性而充满奴性意识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文化气氛里,知识界最易于滋生假道学、伪君子,“会做戏的虚无党”,以至利欲熏心,寡廉鲜耻的名利之徒和衣冠禽兽,却容不得一个直率而

真实的人,一个不尚于虚饰敢于裸露自己的人。人们常说,读郁达夫的作品,使人有亲切之感,原因就在这里。他正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这正是在本世纪初,中外文化交流撞击中,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和人格观念上得到了觉醒和更新的成果,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的最大差异。这种历史的困惑,造成郁达夫终生飘零潦倒的命运,而他的最后以身殉国,死于敌宪之手,又更充分地说明了他不仅是个人生态度严肃、对生活艺术有着真诚的热情和追求的作家,也是对人民对祖国怀有无限热爱与忠诚,充满历史责任感,而又重视个人节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智者,而且是强者和勇者。正如鲁迅先生一样,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品格,也是西方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

其后,在一九九三年,我又在为新疆师范大学黄川教授译的已故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安娜·多勒扎洛娃女士的专著《郁达夫的创作艺术》^①作序时,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特点作了论述;现在李振声约我为他新译的日本铃木正夫教授的专著《苏门答腊的郁达夫》写序时,我又欣然命笔。

铃木先生为了查清太平洋战争时期,从一九三八年流亡苏门答腊岛的郁达夫,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生活处境,以及在日本投降后,又被当地日本驻军杀害的真相,前后花了二十多年的精力,他在查阅了苏门答腊棉兰法庭审讯日本战犯的

^① 出版时,易名为《郁达夫研究》。

档案^①后,又三次只身下南洋,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寻访了许多当时和郁氏有过直接接触的以原宪兵为主的日本人,直至追寻出那个下令杀害郁氏的凶犯,在此基础上撰成了我们眼前这本专著。这是一本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的历史记录,为我们重新认识那场置郁达夫于死地的战争、日军的侵略政策和日本人的国民性,提供了极富文献价值的依据,它足以引起人们严重的沉思和警惕。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又是郁达夫殉难五十周年。但时至今日,日本朝野仍有某些人士,顽固地否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及东亚各国所犯下的这场侵略战争的罪行,某些内阁官员依然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战争罪犯,对我这个曾参加过这场抗日战争,并在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才走出日汪监狱的老人来说,尤感激愤难忍!铃木先生在这部实录中写到,日本天皇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向海内外三军宣布投降的,八月十五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国正式投降,但延至八月二十九日夜晩,投降者一方竟将中国作家郁达夫秘密杀害,因为当时苏门答腊的日本宪兵已查清,曾被他们征用为翻译的赵廉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国作家郁达夫,为了“灭口”,为了掩盖自己杀人放火的侵略罪行,他们遂下此毒手。当今矢口否认侵略罪行的日本朝野右翼势力,与当年苏门答腊的宪兵竟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而身为日本公民的铃木正夫教授,却在今年七月推出了他经过二十多年内查外调的历史实录,并希望它有中译本,尽快与中国读者见面。为此,他特嘱出版这部书的东京东方书店店主福岛正和先生,在书印出后直接邮寄给我,以便他的中译本能尽快地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这也证明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老话。日本昨天的侵略者与今天的右翼势力,

① 据铃木先生来信告诉我,这批审讯记录中有一部分后来归由东京的法务省保管,当年他是受到特别照顾,才得以读到这部分档案的。时至今日,这些档案原则上仍是不准借阅的。